1. 引言

本文探讨的是普通民众对两种民主观念的理解问题，以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这两种民主观念在不同人之间是否具有显著差别？

在中国公众民主观念的研究中引入世代维度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针对中国公众所做的民主观念调查时期都相对较短，通过世代的划分可以利用同样的数据获得民主观念在更长时间范围内的变化趋势，因而可以在更大时间尺度上关注宏观因素的历史作用。

因 此 ,本 文 试 图 回 答 以 下 三 组 问 题 :第 一 ,当 前 中 国 民 众 的 后 物 质 主 义 价 值 观 已 经 达 到 什 么 水 平 ?是 否 具 有 世 代 上 的 差 异 ?第 二 ,中 国 民 众的政治参与是否也具有世代上的差异?第三,也 是 最 重 要 的 一 点 ,就 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否会影响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这种影响效应 是否也存在世代差异?

1. 文献综述和理论
   1. 现代化理论：

经济发展会导致民众世界观和信念体系的某种转型——转型继而带来回馈。

经济发展与那些有助于民主政治的文化转型联系在一起。宽容/信任/多元化/安全（排外主义）/权威（大政府）

帕特南就认为信任、宽容、团结的公民社区与民主制度的效率紧密相关。

后现代主义发展阶段在本质上有助于民主化进程，但这一趋向不是简单和自动的。威权国家可以无止境地镇压。类似的，特定国家的制度结构和文化传统也会帮助或阻碍这种趋向。

现代化带来民主非线性关系（李普赛特—英格尔哈特—世代）/匮乏和社会假设

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必然带来民主化和民主政治的稳定与持续，这一命题也得到了大多数民主化研究学者的证实和支持。正如李普赛特最初指出的那样，民主的社会条件一直是政治学的核心问题，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民主转型，且各国通往民主的道路只有一条，这条道路始于社会经济现代化，终于政治现代化（李普赛特）。然而，许多学者却提出，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观念和价值观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价值观的变化是将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主化联系起来的主要解释机制，学者们需要在经济发展和民主化之间加入了一个中间变量 “政治文化” , 即如果经济发展引发民主转型, 它首先要通过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因此，如果不研究价值观的中介作用，就很难严格检验现代化理论。在此基础上，英格尔哈特从文化主义视角对现代化理论进行补充和修正，他指出民主政治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的必然结果，但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价值观变化，会导致民主政治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因此经济发展、文化嬗变和政治转型有着内在联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可预测的。

英格尔哈从匮乏假设和社会化假设出发，提出经济社会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收入的增加、工业化与后工业化、城市化、教育的普及等——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普遍的代际 “文化转移”，此即从传统权威向世俗——理性权威观念的转型。首先，匮乏假设认为，人们一旦在青年和童年时期确立某种特征，那么他们成年时也会继续保持这种特征。在此基础上英格尔哈特提出，人们在成年的过程中确立的某种固定的优选序列会在他们成年后继续保持。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价值观很大程度上是在其未成年的时期确立的，这种价值观的确立是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而且一经确立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而社会化假设表明随着社会人口的迭代更替, 年轻世代在成年后会逐渐替代年长世代，而与之相随的社会总体价值观也会发生变动。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新老群体的价值观上出现巨大差异。它们由不同的早期成长经历所决定。可见，在单个社会内部，大众政治心理和文化价值的变化是通过代际替换 ( generational replacement) 实现的: 与老一代相比，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在成长过程中所处的经济物质环境存在差异，因此形成了与老一代不同的价值观念。而由于青少年时期形成的价值观在成年以后趋于稳定, 这就导致了一个社会总体上价值观念变化的代际替代效应——随着老一代的离去，社会逐渐由新一代填补，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就发生了总体上的变化。社会化假设补充了匮乏假设，它说明了在社会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新老群体之间在优选的价值观上会有非常明显的不同，它帮助解释了看似不正常的行为。例如，早年经历贫困的个体即使在成年后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也会一如既往地持续积累财富；而贤者即使在极度贫困的情况下，还是会坚守文化所灌输的高尚目标。这两个看似不正常的案列都可以通过他们的早期社会化过程来解释。英格尔哈特认为这两种假设结合起来就能够推导出一系列对价值观变革的稳定预测。这两个假设分别关注到了物质基础和社会化对个体价值观的影响，前者可以推导出短期变化或阶段效应，后者则可以推导出长期的群体效应。

尽管上述文化主义的现代化视角在学术界引起了分歧，双方都有怀疑论者和捍卫者，但它仍然是解释大众民主观念的有力工具。如XXX就发现阿拉伯年轻一代对性别平等和宗教多样性更加宽容、对公民自由和选举竞争更加渴望。但也有学者指出，现代化进程不一定会创造出民主导向的公民（Bellin，2002；Kamrava，2005），威权国家通过向年轻一代提供更多工作机会和更高的福利待遇，促进了大众对威权领导人的认可和政府信任的加强。如金和周就发现，中国最年轻的一代，即“习一代”， 他们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较前代更加倒退，威权主义倾向更明显。陈和杨通过对中国精英大学学生的实验调查发现，互联网在改变年轻一代价值观方面的有效性远大于经济发展。Cantoni 等人的研究发现，中国进行的思政课程改革显著地影响了最新一代学生的价值观。上述研究都呈现出现代化理论在中国遭遇困境，中国仍然是“比较民意研究中令人困惑的异类”。

然而，宏观因素在时期和队列上的作用机制是有差异的，出生队列效应不同于年龄效应和时期效应这一事实并不直观，而且往往被忽视。英格尔哈特通过对美国民粹主义盛行的研究就发现，出生队列效应的存在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即经济因素不能解释为什么特定的人会投票给民粹主义政党——但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民粹主义投票现在比过去强大得多。

然而，关于中国公众民主观念变化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并未进行长时期的观察，同时也没有探求不同世代之间民主观念变化的差距。尽管吕杰认为中国60年代出生的世代比80年代出生的世代持有更多的监护型民主观念，但该研究只是借用横截面数据

后现代主义转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淡化对权威的强调。

具体而言，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丰富使人们的价值观优先从关注物质安全转向关注自我表达，即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经济成就、物质安全的强调让位于对生活质量、自我表达的强调，体现出从生存价值观向自我表达价值观的转变。

在政治领域则表现为这种对权威的淡化、公平竞争等程序性观念的认可以及对政治参与和自我表现的日益强调。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文化这两个变量之间, 经济发展高度影响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经济发达的国家自我表达的价值明显偏高, 反之则否。现代化理论最有力的支持者 Lipset (1994, p. 3) 也宣称，对于民主的前景而言，文化因素比现代化更重要。

2.2 民主观念

围绕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来组织民主的含义由来已久。从熊彼特（1943 年）到普沃斯基等人（2000 年），民主通常等同于自由公正的选举。在熊彼特的著名论述中，竞争性选举是民主的黄金标准，而与社会经济和社会特征相关的问题，如社会正义、社会平等或腐败，通常被认为是民主政治进程的结果或后果，而不是民主本身的特征（Collier &amp; Levitsky，1997；Karl，1990;Donnell，2004）。随后，达尔在其著作《多头政体》中确定了定义民主的八个标准，实际上是将民主等同于民主政府的机构和程序。如果公民能够平等地参与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并且选举指导政府的行动，那么这就是民主的本质。这种制度/程序上的选举民主定义通常被接受为民主制度的最低标准。虽然学术界对民主的定义侧重于政治，但民主的公众形象也可能具有社会层面——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许多研究表明，不同国家的人们赋予民主这个词不同的含义（Canache，2012；Dalton 等，2007；Mattes 和 Bratton，2007），大众对民主的理解是复杂而多方面的（Bratton 等人，2005；Bratton 和 Mattes，2001；Camp，2001；Carrington，2008；Dalton 等人，2007a，2007b；Miller、Hesli 和 Reisinger，1997；Ottemoeller，1998；Sarsfield，2007；Schedler 和 Sarsfield，2007；Shin，1999）。一些分析家声称，发展中国家当代对民主的支持只是对更高生活水平的支持。如果民主与富裕、发达的工业社会联系在一起，那么对民主的支持就意味着希望实现同样的经济标准，但不一定是同样的政治标准（Hofferbert and Klingemann 1999；Fuchs and Roller 2005）。T. H. Marshall (1992) 的研究就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居民都专注于经济需求，例如社会服务和普遍福利，而对民主的政治含义缺乏真正的理解。

作为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流行的民主观念对民主的出现和巩固的前景具有重大影响。针对这两种选择——程序/竞争与社会福利——构成了公众对定义民主的主要维度。程序性民主观念强调制度公正性为民主的基本特征，是基于对民主所体现的政治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欣赏，民主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即使在经济衰退或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它也有潜力维持脆弱的政治政权(XXX)。与此相反，功利性民主观念强调治理结果为民主的基本组成部分，公民对民主的支持是有条件的，如果政权能够促进提高福利水平、缩小贫富差距，那么公众很可能会屈服于民粹主义领导人的诱惑，以政治自由换取经济发展。例如，克劳德·阿克通过对非洲多少个国家的调查发现，非洲民主运动追求具体的经济和社会权利，而不是抽象的政治权利；非洲人民坚持将经济机会、社会改善和社会福利制度作为民主的核心观念。他们认为，民主的价值不在于它是什么，而在于它能做什么。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人们并不一定只是单纯持有程序性或功利性的民主观念。许多研究表明，人们大多以混合方式解读民主(XX)。因此，当我们谈论以民主观念衡量的“文化差异”时，我们指的是持有不同比例的混合观点。还应该澄清的是，这两种民主观念在实践中并不相互排斥，许多民主程序强大的国家也提供了丰富的效用。因此，我们希望将民主观念划分为不同的产品组合：功利性产品组合（包括促进经济发展、提供就业机会、缩小贫富差距）和政治产品组合（包含自由公正的选举、言论自由、制度化的政治权利保护）。如果人们在判断民主时，能够分别且正确地区分一篮子经济商品和一篮子政治商品，认为政治商品似乎比经济商品更重要，那么我们就可以阐明“程序性民主与功利性民主”的争论。

这些研究都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即年龄、队列和时期的交互作用可能会影响观察到的趋势。此外，这类研究过分聚焦于时期趋势，而忽视民主观念在其他时间维度上特别是队列上的变化趋势。

3. 假设

曼海姆 (1928: 232)提出：“经历过同样具体历史问题的年轻人可以说是同一代人的一部分”。这些经历被认为会结晶和区分人口中的几代人，即使他们在生命历程中逐渐成熟，因此代际差异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是不变的。因此，正是关于历史社会化时期对与之前（和之后）的群体不同的群体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影响的理论预期，人口群体才可以被赋予内容，并被确定为不同的政治世代。如萨克通过对东西德不同世代持有民主观念的实验分析发现，对于较年长的群体而言，在民主德国长大的人比在西德长大的人更支持社会主义价值观，而对于 1985 年或之后出生的最年轻的一批人来说，由于他们在统一的德国接受了社会化教育，因此他们对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观的支持程度并无差异。可见，由于不同出生队列所处的社会发展条件不同，导致公民在日后形成了不同的民主价值观。XX的研究也表示，

H1a：不同世代之间的民主观念具有显著差异

现代化理论的文化主义强调国家的宏观发展（例如GDP）和文化价值观的变化对于解释群体民主取向的更替至关重要：具有传统价值观的老一代群体逝去，被年轻的群体所取代。由于年轻一代的群体在成长过程中拥有更多的物质保障和更好的经济发展情况，因此世俗和自我表达价值观将会在年轻群体中更加普遍。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由物质匮乏和黄油面包驱动的“腹中政治”会逐渐让位于强调程序和自由的“体面政治”。因此，持有和欣赏民主价值观的公民是现代化过程的副产品Coppedge（1997）。因此，我们可以预测，如果一个社会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发展和物质繁荣，我们就会在该社会里发现新老群体在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异——年轻人可能比老年人更加强调自我表达价值观。这些代际价值观的差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会保持持续稳定的状态，虽然暂时的或直接的经济波动会造成短期起伏，但新生代与较老群体之间的基本差异的趋势并不会改变，即使年轻人的年龄在不断增长，他们也不会接受老一代的价值观，使再过二三十年，年轻群体也仍会表现与当初一样的，他们这代特有的那些价值观。就中 国 的 情 况 而 言 ,根 据“ 匮 乏 假 设 ”的 观 点 ,出 生 在 物质丰富时期的世代群体对于物质的需求程度会远低于出生在物质匮乏时期的世代群体(丛日云、王路瑶,2013)。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出生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民众产生以生存为主的意识,并对物质有较大的依赖性,而出生于改革开放后期的民众由于社会经济进入飞速发展阶段,物质相较之前充盈许多,因此对于物质的依赖有所缓解(高海燕等,2022)。那些成长于市场化改革时期的“80后”“90后”及“00后”青年更是生活在物质条件较为丰富的时代,生活方式、消费习惯、艺术审美、价值取向等都不同于前几代人,且能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追求应有的社会公平正义,这些都较为明显的表现出对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追求与倾向性(曾竞,2018;陈霞、曾媛,2015)。

据此，我们提出：

H2：经济增长导致新老群体的民主价值观具有显著的世代差异

根据前面的文献综述，我们发现经济增长并不是直接带来民主价值观的转变，而是通过一系列范围广泛且有内在联系的转变症候群。在转变中，经济发展与那些有助于民主政治的文化转型联系在一起，如对宽容、多元化、淡化权威、性别平等。简而言之，经济发展会导致民众世界观和信念体系的转变——转型继而回馈到民主价值观。例如，帕特南就认为信任、宽容、团结的公民社区与民主制度的效率紧密相关。在政治领域，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的性别角色限制被打破，这不仅反映在女性在教育、就业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上越来越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也反映在日趋强调男女平等的价值观上。作为人类平等的核心内容，性别平等价值的扩大和深入有助于推动政治平等、人权实现等方面。在社会领域，在较高经济和生存安全条件下的人也会对不同性取向更为宽容，对性行为的选择更加宽松，对同性恋的也认可快速扩大，也较为支持“女权运动”，这有助于培养一种宽容和包容的文化氛围，而这正是民主政治的必要部分。

在经济领域，经济发展还导致对分权性和参与性管理风格的重视。一方面，与臃肿的官僚机构和庞大的管理部门的扩张相反，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则将个人表现置于经济效率之前，对集体化官僚权威和大规模国有企业的认可度下降。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人们对个体自主性的日益强调，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自由职业和个体经济。这两个转变趋势都牵涉对科层制权威模式的抛弃和对个人自由的日益强调。例如，有 关 中 国 的研 究指出,与成长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年长世代相比 ,成 长 于 经 济 大 发 展时代的年轻世代,由于具有更大的自主行动空间和更 强 调 自 主 性(即 更鲜明的后物质主义倾向),进而与年长世代相比更 少 参 与 投 票 选 举 活 动 ,而 更 多 选 择 非 传 统 抗 争 型 参 与 活 动(易 申 波 、肖 唐 镖 ,2017)。也 有 研 究通过对 2000 年 和 2007 年 世 界 价 值 观 调 查 数 据的 分 析 ,指 出 成 长 于 改革开放后的青年后物质主义者比例最高,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 速增长和物质条件的不断丰富,他们会给予那些非物 质需 求(即 政 治 参 与 和 言 论 自 由)更 高 的“ 优 先 权 ”(王 正 绪 、游 宇 ,2012)

鉴 于 自 主 性 、自 我表 达 、批 判 性 等 意 识 被 视 为 后 物 质 主 义 价 值 观 的 主 要 表 现

经济发展带来的性别平等、容忍多元化以及个体自主性显然有利于“批判公民”(critical citizens)(Norris,1999:1)的出现，从而推动自由竞争民主观念的形成。

据此，我们认为：

H3a：经济发展通过促进性别平等观念的增加，从而提高了程序性民主观念

H3b：经济发展通过促进多元包容的价值的出现，从而提高了程序性民主观念

H3c：经济发展通过强调个体自主性，从而提高了程序性民主观念

4方法

4.1数据

本文使用WVS第四轮(2007 年) 、第五轮(2013 年) 和第六轮(2018 年) 的调查数据。由于 WVS 数据时期跨度较长,我们使用该数据进行主要的年龄—时期—世代效 应 分 析。

4.2方法

4.2.1 APC分析

在政治学研究中，分析年龄、时期和队列效应的相对重要性对于了解社会变革的起源和轨迹通常至关重要(Elder,1974:177;MayerandSchoepflin,1989)。年龄效应/生命周期效应：

时期效应是指外部因素的瞬时效应，而世代趋势则反映了外部因素与个体内在发展的交互作用，即外部的历史因素作用于不同生命阶段的个体，从而对人群产生了分化。年龄、时期和世代对观念的变化并不相同。如XXX，现有关于出生队列的民主观念研究主要采用横截面数据，并没有将年龄、时期和队列效应区分开来。为了分离出年龄和时间段的混杂效应、

破除三者之间的相互干扰因素、得出“纯”队列效应，本文采用了Age-Period-Cohort模型。

依据已有研究对 APC 模型的总结( Yang & Land,2013) ,我们将国家认同的 APC 模型表达为如下方程式:

YNI = α + γi·Age + δj·Period + βk·Cohort + ε

其中,YNI表示个体的国家认同水平,γ 表示年龄的系数,δ 表示时期的系数,β 表示世代的系数。这使得我们能够对民主观念的代际差异做出有意义的评价。如果不将所有这三种效应都纳入模型中，而是使用重复横截面的数据进行估计，从而观察个体在其生命历程的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历史时期，那么就不清楚出生年份分组的效应是否真正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化效应，而不是特定调查年份的生物衰老和/或不同背景影响的效应(Mattei,etal.1990;JenningsandNiemi,1991;EvansandDeGraaf1996;VanDenBroek,1995;AndersenandFetner,2008)。因此，通过对于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塑造公民所持有的民主观念，以及这些世代差异效应的可持续性如何，我们可以获得新的见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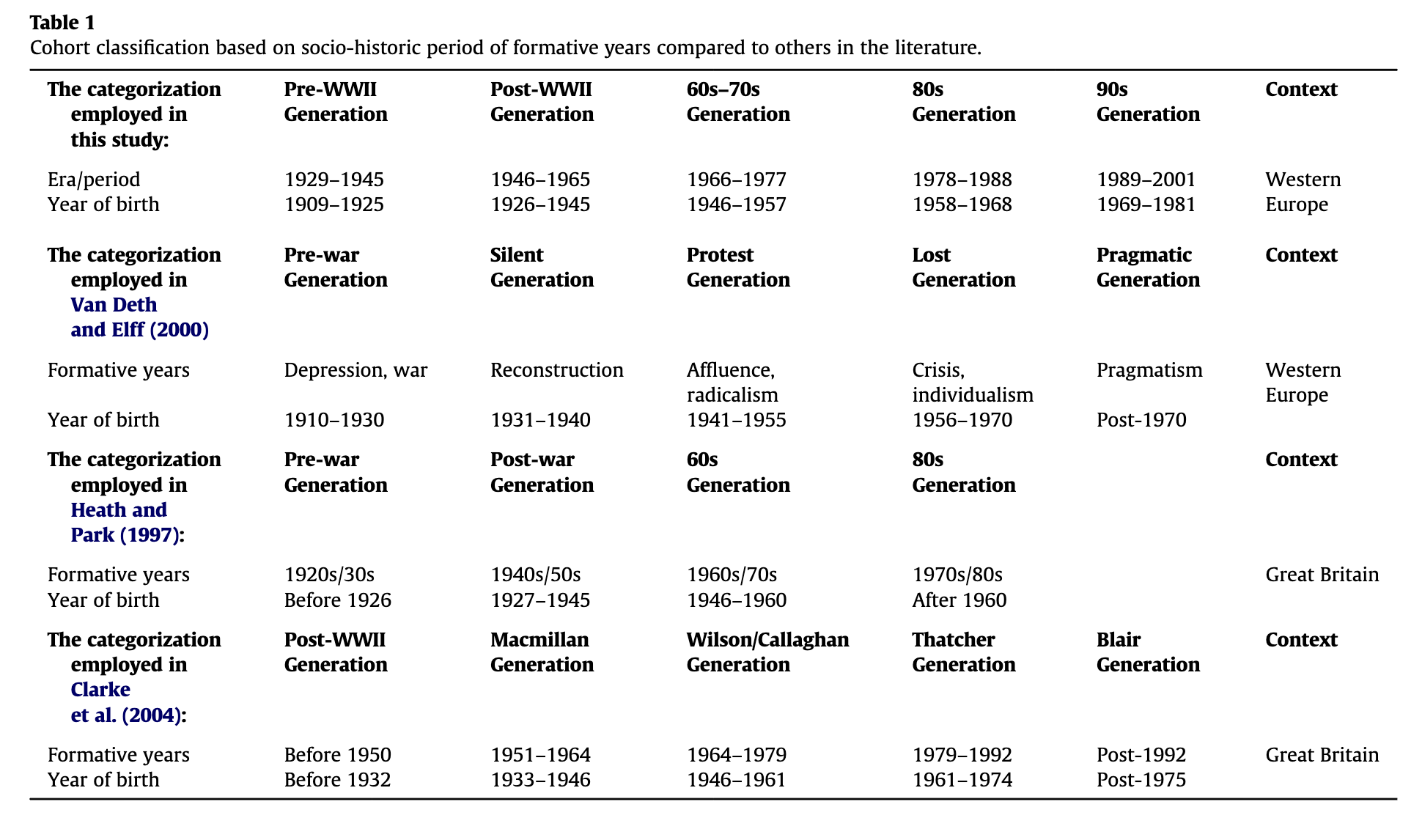
4.2.2 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的目标不仅是估计经济发展对代际民主观念差异的影响，更是要探明产生影响的具体过程，因此本文采用中介分析来评估潜在机制(Imai et al., 2014)。

4.1世代的划分

对于世代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根据人口学标准，按照3年、5年或者10年为一代，进行划分。XX就是根据

第二类则是尽可能利用现实事件所造成的世代区隔，从而以历史、社会、文化的视角根据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来进行划分。Jennings(1987:368)认为快速的社会经济变革对个人在政治意义上通常具有独特的身份意义，因此他将美国人分为“大萧条一代”、“沉默的一代”等。Becker(1990:2;1992:222)则根据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共同特征为依据，将美国人分为“战前一代”、“沉默的一代”、“抗议的一代”、“迷惘的一代”和“务实的一代”。这种分类方法也被范德斯和埃尔夫(2000)用于西欧和其他研究，表1列出了这些分类方法，并与本研究开发的非常相似的分类方法进行了比较。



关于中国的世代划分，XX以重大的经济事件为界，将中国划分为“改革前（1978年以前）”、“改革期（1978年-1989年）”、“改革中（1989年以后）”；也有人根据社会重大事件将中国世代划分为“抗日战争（1931-1945）”、“解放战争（1945-1949）”、“三年饥荒（1959-1961）”、“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等。为了尽可能贴近经济发展对民主观念的变化的影响，本文借鉴苏等人的划分方式，将中国人划分为“战争的一代（1912-1945）”、“失落的一代（1945-1960）”、“幸运的一代（1961-1970）”、“转型的一代（1971-1980）”、“单孩的一代（1981-2001）”。

单孩一代：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的执行，导致中国大多数家庭只生育一个孩子，这大大提高了年轻一代享受优厚物质资源的机会。

5.结果